

# “五四”启蒙精神的承传与对精英化写作姿态的反叛

— 赵树理小说比较研究探析

[中国] 朱凌\*

## 目 录

引语

1. 传统与现代的选择
  - 1) “现代”视阈的拓展
  - 2) “建构”与“解构”之张力
2. “五四”启蒙精英姿态与大众化启蒙姿态的选择
  - 1) 大众化的“民间立场”
  - 2) 启蒙：姿态与精神
3. 知识分子身份与农民身份的双重选择
  - 1) 自我“身份”的选择
  - 2) 文化“身份”的确认

结语

## 引语

随着对赵树理研究地不断深化，比较的方法被频频引入赵树理研究。这与赵树理及其自身作品的复杂性密不可分。他既承载着“五四”启蒙现代精神，又将“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精英化写作姿态击碎，将“文坛”变为“文摊”，以一种立足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植根现代又反叛现代的精神，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继续下去。如果把五四新文化、左翼文化、大众文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分别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同的话语机制，赵树理小说没有屈从于其中任何一种机制

\* 中国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的束缚。他以传统形式为基础，并在所处时代环境中不断拓展自身存在的“民间”理念的价值和意义，使自身成为独立于时代语境中多重复杂因素交织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因此，无论是赵树理本身还是对赵树理的研究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正是由于对这种复杂性的审视，我们发现赵树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推动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并将赵树理的复杂性体验作为对乡野文化生态的存在价值或对通俗文学的价值拓展的标准，也作为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价值的重新构建的理性依据。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恰恰是在这种复杂性的演进更替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赵树理小说比其他乡村题材作品创作更具独特的意味，将对其作品的比较研究作为对象深入分析，进行系统解读具有促进文学史发展的现实意义。

## 1. 传统与现代的选择

### 1) “现代”视阈的拓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力图颠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影响。事实却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十世纪40年代，在上述复杂的历史语境下，赵树理针对农民这一广大的受众群体，对中国古典传统进行现代性的利用和转化。于是赵树理的小说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五四新文学的延续。在对赵树理小说的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小说的现代性并非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完全决裂。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端也并非始于“五四”。赵树理对20、30年代以来“五四”现代小说形式的偏离和重新选择传统，实际上不是背离，而是扩大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视阈。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本就存在可以向现代转化，被整合、融入进现代文学的潜在因素。

吕汉东的《两种中国味：赵树理与汪曾祺》<sup>1)</sup>中论述，赵树理的“山药蛋味”

与汪曾祺的“高邮味”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赵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化为主导，以民俗文化和地理文化为辅，从而形成多元整合的以‘俗’为主的入俗美的审美特色”；汪作品“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为主，以民俗文化、地理文化和外国文化为辅，从而融合为以‘雅’为主的素朴美的审美特色。”文章在对赵、汪两位文学大师的“中国味”对比过程中两人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在比较过程中突出了传统文化对赵树理创作的深远影响。文章从文学到文化的观照，从艺术风格到文艺美学的阐释，正扩展了赵树理小说研究视阈的必然趋势。1954年赵树理在一篇谈论戏曲改革的文章中，把文艺遗产分为三种：“古典的”、“民间的”和“外国的”。“外国的”指的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古典的”即“传统的”。赵树理赵树理对于“民间立场”的偏爱，对于“启蒙立场”的否定，并不是它否定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从政治革命立场来看，“启蒙”的目的是发掘人民大众中所存在的现实斗争的巨大力量，即通过运用民间艺术形式传播革命观念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这在本质上仍然是精英化启蒙立场的延续。从真正的大众化民间价值立场来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民间所包含的自由、乐观、纯朴、善良的观念。赵树理、老舍、沈从文等作家运用通俗文学的形式，将启蒙时代的“民间立场”延续下来，特别是赵树理将“民间立场”作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这三种形式的民间立场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是它们是相互承继延续的。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将“民间”特别是“农民群体”作为自己精神的栖息地，真正从民间的道德伦理、生存逻辑去了解农民，从而表达了他对启蒙文化、政治立场、社会文化潮流的认知态度，体现了民间文化形态自在自为的生存欲望和内在逻辑。1966年赵树理的长篇回忆文章《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再次重复了40年代对五四新文艺“把现在尚无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的批评，“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要继承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事实如此，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sup>2)</sup>他将五倡四新文

1) 吕汉东，《两种中国味：赵树理与汪曾祺》，《宁夏大学学报（哲社版）》，宁夏大学，1999年第4期，第81页。

2) 赵树理，《回忆自己，认识自己》，收入《赵树理文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0-1841页。

艺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样表述“经过‘五四’所创之统是宝贵的，是应该继承的，但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喜爱之统就不应继承吗？再不能上学的人就不应该有接受艺术的机会吗？我们的下一代把两个统都继承起来不更好吗？为什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来消灭一个呢？我以为把民间传统继承下来是有必要的。”<sup>3)</sup>

赵树理还认为无论何种形式的“现代”必须滋生于“传统”的土壤。范家进的《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什么关注乡村》通过对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位乡土小说家的比较，可以看出三者对传统与现代的不同态度。鲁迅先生在古籍整理、文学史和文字史研究领域都作出了突出成就。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的基本诊断则是‘欺和瞒’”。由传统习俗相当浓厚的乡村走出的赵树理，极大影响着他对传统的基本姿态。在实践过程中，赵树理极力开拓将传统归于现代的轨道。例如，运用对读者“无间离”的叙述话语，利用评书、口头民间故事、曲艺、说唱等方式，还有一些戏曲的方式的运用，创作出戏曲、鼓词、快板、评书等样式。这种“说故事”和“戏剧化”的方式的运用正是对于传统的借鉴。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个“套子”：总有代表乡绅恶霸的“坏人”势力欺压以广大农民为代表的“好人”，代表进步势力的“好人”总遇到无法解决的关口，而这个困境总要靠“上面”来解决，这个“上面”的责任就落到了“支书”或上级身上。正如《小二黑结婚》，最后是“由区长、村长支撑着弄个大团圆”结局。这正是传统小说的特征之一。也正是赵树理对传统小说创作手法的承继，即“清官断案”的创作手法。然而，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并非仅仅蕴含传统因素，它还包含着赵树理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启蒙意图。正因为如此，这里的“大团圆”不同于传统公案小说“大团圆”的折衷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是体现了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终极的人文关怀。这是杨品的《做公众的代言人——从赵树理到张平》比较两者“清官断案”的思路。作为两个时代的公众代言人，两人能维系其联系的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文关怀。通过这两篇论文中的比较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的作品中传统中蕴含现代，现代的思想由传统的形式传递出来。

3) 赵树理，《“普及”工作旧话重提》，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6月16日，收入《赵树理文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6页。

## 2) “建构”与“解构”之张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税海模的《鲁迅、赵树理与毛泽东——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轮廓》，这篇论文提出一个大胆新颖的观点：鲁迅、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标出两个相反相承的文学命题。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功绩在于“他扬弃了中国旧有的士大夫文艺传统和民间文艺传统，为中国文学成功地引起了西欧近现代文学‘范式’，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立下首功”，赵树理则是用“民间文艺传统去变革欧化的”，建立革命文艺大众化新“范式”。<sup>4)</sup>在这种“建构”-“解构”-“再建构”的动态发展活动中，“毛泽东”起着关键的“政治之力”的作用。艺术家冈布里奇曾经概括出一个艺术发展的公式：预成图式-匹配-修正。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论点就在于这“建构”-“解构”-“再建构”之间。赵树理之所以与同时代的作家不同，能够纵横上下地进行历时或共时的多方位比较，是因为他的理想贯通了中国上下历时五千年。在传统中建构延续“五四”现代精神，又在“五四”文学中将“精英化”的现代姿态解构，而建构他理想中的现代文学——倾向于大众的现代文学。这种类似于后现代的解构方式，使文学在现代与后现代的演进之间继续着现代化的脚步。王吉鹏在《鲁迅与赵树理》讨论了一番“双向互逆景象”<sup>5)</sup>：“鲁迅以城市知识分子精英的眼光俯视乡村民间文化导致了其小说的文化批判的抽象化、姿态性，而赵树理以源自乡土的‘原乡’情结和亲向的目光检索着乡土文化则导致了他自足的文化心态。”雷水莲在《鲁迅与赵树理的互补性文学意义》中也指出，“大众化”背景下的赵树理“在传承鲁迅启蒙立场的前提下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在中国现代期的文学话语中，鲁迅和赵树理以不同的姿态，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民族的劣根性进行审视，共同构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互补性的文学意义。”<sup>6)</sup>通过以上这些论述，赵树理小说中的“农

4) 税海模，《鲁迅、赵树理与毛泽东——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轮廓》，《贵州社会科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2000年第3期，第53页。

5) 王吉鹏，《鲁迅与赵树理》，《东方论坛》，青岛大学，2005年第5期，第28页。

6) 雷水莲，《鲁迅与赵树理的互补性文学意义》，《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淮北煤炭师范学院，2005年第2期，第98页。

民视角”与“反农民文化”，五四文化与“反知识者视角”，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似的矛盾。这种充满悖论式的叙述模式，是作者的思想意识超越了接受者，而又自觉接受后者的潜在制约，获得了与相对欧化的“五四”小说不同的陌生化效果。孙萍萍称：“叙述人的超越姿态无疑是重要的，它决定了文本内在的反封建的文化指向，而对于一心要让农民‘听得懂’、‘感兴趣’的赵树理来说，接受者的农民身份对叙述人的叙述方法的限制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它促成了五四反封建精神的最终以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而被农民接受，为现代乡土小说民间的真正兴起提供了有力的参照。”<sup>7)</sup>比较鲁迅革新立意态势，赵树理建构“现代”的意图和行动都似乎迟缓很多，然而，这正是他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所找寻的新的契合点，解构知识分子精英化写作元素，重新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新的思路和范式，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抹杀的浓重一笔。

再来谈一下张爱玲与赵树理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赵树理和张爱玲这两位来自于解放区和沦陷区的作家同时选择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偏离了20、30年代以来五四新文学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传统，而是向传统文学形式中去寻找营养。从而建构了以大众文化意识为导向的现代小说的范本。首先，他们都致力于“有故事的小说”。<sup>8)</sup>张爱玲与赵树理都与传统文化有着极深刻的渊源。两人似乎都在有意识的偏离“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模式。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旧式贵族家庭，长期生活在十里洋场上海。虽然她接受了五四新文艺的影响，但是在这个高门大族的贵族小姐身上，却充满了市井气息。她排斥“五四”精英立场，与当时的“左翼作家”也保持了距离，而对于传统文化却情有独钟。张爱玲的小说常常被拿来与《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相比较。张爱玲偏爱这两部著作，不仅将《海上花列传》书稿译成英文并改写，还写了《译者识》和《译者记》这样视角独特的评论，大大推动一股读者阅读和欣赏这部小说的热情和积极性。赵树理虽然早年在长

7) 孙萍萍，《继承与超越——四十年代小说与五四小说》，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8) 赵树理曾说：“任何小说都要有故事。”（《〈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 第19期，张爱玲也说过：“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自己的文章》）。

治师专读书时模仿过一阵“新文艺腔”，但很快就有转向了传统民间文艺传统，立志成为一位“文摊”作家。张爱玲和赵树理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有所不同，但是两人对“五四”现代精英文化采取了一致的摒弃的态度。周云鹏在《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传统》中论述，赵树理与张爱玲背弃了五四新文艺传统，“与赵树理背离五四文学的主流艺术形式不同，张爱玲的创作显示了较为开阔的艺术吸纳姿态，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新鸳蝴小说，又迥异于新感觉派小说的新‘传奇’体小说。”<sup>9)</sup>从张爱玲与赵树理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五四新文化精英姿态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而他们对传统文化因素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各有取舍。他们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他们对“五四”现代文化精神的继承是无需质疑的。他们都是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一种新的姿态将现代文学的发展继续下去，将作品赋予独特的艺术张力，吸引了众多读者。这正是他们的作品游刃有余的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超越了五四文学的“现代”，将作品延续至一种后现代的“解构”，将反传统的精英模式击碎，将传统文化纳入文学创作的体系，形成一种比五四新文学更具“现代性”的文学范式。

对赵树理的比较研究论述中体现着“现代性”对传统文艺资源的重新整合，对现代的“另类”想象，对现代主体的不同构想以及由此创造的不同的文本样式。将赵树理与同时代或同题材作家纵向或横向比较显然联系着中国历史、社会的变化，同时也与80年代之后迅速展开的有别于50-70年代的现代化方式有关。赵树理本身的文学创作观念虽然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有些许迟疑与细微的调整，但他对“五四”精神的坚守与对“五四”精英化写作姿态的反叛<sup>10)</sup>的文学观念却未曾改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赵树理并不囿于历史的选择，而体现出了自身的对“现代性”认定姿态。我们在关注赵树理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线索，将其

9) 周云鹏，《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传统》，《云梦学刊》，湖南理工学院，2002年第4期，第56页。

10) 包括对“民间”信仰的执著，对民族传统探索、对大众化的诉求、对群众的亲和等都从客观上造成了赵树理对“五四”精英化写作姿态的反叛。

置于各个时期的“现代性”语境中，深入到当代文学话语秩序的内部，探寻其中各种文学力量相互冲突、磨合、转换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进一步对“当代文学”的建构、发展、转向深入进行探索，解决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必须面对的复杂矛盾。在当今学术研究多元化的视野下提供了自身“现代性”多元化阐释可能性以及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 2. “五四”启蒙精英姿态与大众化启蒙姿态的选择

### 1) 大众化的“民间立场”

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民间立场”是“五四”时代就存在的。李大钊、周作人、胡适等人都明确地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民间”顾名思义应该指底层、平民的那一块文化空间。这种“民间立场”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精英化的启蒙视角。这个时期的启蒙主题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民间文化形态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视野是与他们的文化启蒙思想如何建立新文学的现代审美标准密切相关联。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关注民间，更过的关注是民间的愚昧无知、腐朽麻木；从政治革命立场来看，是在人民大众中所存在的现实斗争的巨大力量，即运用民间艺术形式传播革命观念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仍然是精英化启蒙立场的延续。从真正的大众化民间价值立场来看，看到更多的是民间所包含的自由、乐观、纯朴和对他们平等的理解。赵树理、老舍、沈从文等作家运用了一种特定的民间形态，即通俗文学的形式，将启蒙时代的“民间立场”延续下来，特别是赵树理将“民间立场”作为创立的基本原则。这三种形式的民间立场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是他们是相互承继延续的。虽然“民间”指涉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但是向林冰仍然在40年代“民族形式”的论争中提出：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显然是对30年代关于“大众化”讨论中出现的“民间”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在“对象”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又将“民间”特指为“工农兵”和“人民”。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民间”的内涵，也不会改变所延续下来的“启蒙”自上而下的精英姿态。赵树理的“民间立场”既延续了内涵，又将“民间”特别是“农民群体”作为自己精神的栖息地，真正从民间的道德伦理、生存逻辑去了解农民，从而表达他自己对于启蒙文化、政治立场、社会文化潮流的认知态度，体现了民间文化形态自在自为的生存欲望和内在逻辑。至于赵树理的小说如何以退守“民间”的平视姿态来成就另一种形态的启蒙，如何以这种姿态超越“现代”而推动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鲁迅是从启蒙立场理解“民间”的，无论是《阿Q正传》、《祥林嫂》或是《故乡》都是鲁迅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的文本。而老舍、沈从文、赵树理是将自己立足于“民间”，因此他们对“民间”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放弃了启蒙者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在精神上与笔下的下层民众处于同一种文化空间中，透露了这个世界中的质朴、生动与生存的智慧。当然，也不能就此否认他们作品中的“启蒙”意义。

赵树理的“民间姿态”的启蒙叙述是具有时代背景的。“五四”伊始，“五四”精英知识分子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新文学如何能够以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真正地深入到城乡的下层百姓。早在1927年《革命时的文学》中鲁迅就“平民文学”这一概念有详细地论述：“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sup>11)</sup>30年代左翼文坛也在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一经成立，出于政治的需要，对高居于庙堂之上的五四新文学开始反思，积极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北斗》、《文艺新闻》、《文艺导报》等刊物发表了关于大众化问题讨论的文章，一些“大众化”、“方言小说”等尝试既没有通俗文学应有的娱乐功能，又与实际的大众文学有很大的距离，只能是高居庙堂之上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空中楼阁”似的大众精神食粮。抗战时期，为了争

11) 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团结最广泛的群众，“大众化”、“民族化”又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个时期的时代大环境决定了必然要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以创造一种适合独立民族国家的普泛性的民族形式。中国在反抗西方世界对传统文化世界的现代性重新构造的同时，建立起中华民族独特的现代性文化模式。这种“现代性”的方式，正是对“五四”启蒙的现代性的延续和重构。赵树理的小说产生于这个年代，它虽然不完全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可以说赵树理在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中成就了一个时代，同时40年代的文学空气则在某种无意识的情况下成就了赵树理。张爱玲与赵树理几乎同时成名于1937-1949年这个中华民族从血与火走向新生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这个时期是以战争与救亡为主题的时期。人们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心态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无论是沦陷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的文学创作都会打上战时的烙印。这三个区域是以政治性为标准的划分，在这里的文学创作都或隐或现地呈现出每一区域文学在不同政治势力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创作特色。但是无论是在解放区语境下的赵树理、还是沦陷区语境下的张爱玲，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背离了“五四”精英文化传统的文学之路。这在周云鹏的《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中论述赵树理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表现在：“（一）对启蒙(救亡)立场传统的继承。……不过，与五四时期强烈的启蒙味相比，赵树理的作品一改那种作品(作家)/读者(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与农民读者之间进行轻松、自然、平等的对话(交流)，启蒙的意图往往被含隐在字里行间。（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sup>12)</sup>

1939-1942年间，由延安文艺界发起，蔓延至重庆、成都、昆明、晋察冀边区及香港等地开始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民族形式”的提出是基于抗战的大背景，也是基于党中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向农村转移的背景。正如周扬所说：“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地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地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

12) 周云鹏，《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传统》，《云梦学刊》，湖南理工学院，2002年第4期，第54页。

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sup>13)</sup>1939-1942年的讨论核心不存在于对五四文学精英姿态的批判和改造，而是如何在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其更丰富的文化资源，创制一种更有包容性的现代文艺的新形式。这个时期赵树理的创作恰恰与这个时代的声音相契合。“赵树理发现在五四乡土小说和农民读者之间明显缺乏一种中介式的文本，而不管他是否承认，他后来创作的小说都在事实上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正是在对如何将五四乡土小说内在的启蒙文化精神进行通俗化的改造，以适应农民口味的思考中，赵树理开拓了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农民叙事话语模式’，将五四乡土小说中蕴含的启蒙意识以独特的方式传入民间，创造性地发展了五四以来的现代乡土小说。”<sup>14)</sup>赵树理作为话语主体的革命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隔绝与五四新文学所开拓的现代传统。即使在40年代“启蒙”成为非主流话语的时代，这一传统也会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渗透文本。对此，赵树理有着更清醒的认识：“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是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sup>15)</sup>然而，赵树理自身对乡土的热忱以及时代的“大众化”声音，使他的创作放弃了“启蒙”精英化的角度，而选择大众化的“民间立场”。有的人就认为：“赵树理的大众化是通过通俗化的手段实现的。”<sup>16)</sup>赵树理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他有成就了一个时代。这在关于赵树理与“五四”作家的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白帆在《论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中论述“随着文学样式和语言的回归或者说是‘大众化’，赵树理也为自己找到了最佳的位置，那就是农民的启蒙者和代言人的双重身份。他始终无法摆脱的农民身份和‘五四’情结在他的创作中找到了契合点。”<sup>17)</sup>潘磊《赵树

13) 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14) 孙萍萍，《继承与超越——四十年代小说与五四小说》，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版，第182页。

15)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第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版，第277页。

16) 杨新敏，《赵树理问题小说与“五四”问题小说之比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山西师范大学，1992年7月，第71页。

理与路翎之比较》中路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对“五四”启蒙精英立场的坚守。赵树理在坚持五四新文学启蒙和现实主义的同时，使他的小说更加通俗易懂，更为普通群众所接受，这就弥补了五四新文学未为广大底层群众所接受，因而未能达到广泛启蒙的目的的这一缺憾。“作为赵树理和路翎创作思想导向的《讲话》为文学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方向，这本身就蕴涵着一种新文化的创造。在《讲话》的影响下，赵树理和路翎在20世纪40年代都达到了各自的创作高峰，他们都深入民间，赵树理以接受主体作为创作过程的核心，路翎凸现的则是创作主体本身，二人均拓展和丰富了小说这一文体的美学意蕴。”<sup>18)</sup>

## 2) 启蒙：姿态与精神

赵树理的小说以退守“民间”的平视视角来成就另一种姿态的启蒙，并以这种姿态超越“现代”而推动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鲁迅是从“启蒙”立场理解“民间”的，《阿Q正传》、《祥林嫂》、《故乡》等都是鲁迅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的文本。而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立足于“民间”，对“民间”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们放弃了启蒙者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试图与笔下的下层民众处于同一文化思维空间中，并发掘“民间”世界中的质朴、生动与生存的智慧。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他们作品中的“启蒙”意义。董大中的《鲁迅与赵树理》、杨新敏的《赵树理理、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形象的比较分析》、林铭的《解读“农民意识”——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的比较分析》、李占伦的《鲁迅和赵树理农民小说的比较》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赵福生的《鲁迅、赵树理与高晓声贯通论》是90年代最早运用历时性比较方法研究赵树理的论文。文中论述鲁迅站在“启蒙”的立场上“画出国民的魂”；赵树理则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创作“问题小说”；高晓声是“脚踏两只船”，通过“吃”、“住”来描绘农民的特殊心态。同样

17) 白帆，《论赵树理与“五四”新文化》，《晋中学院学报》，晋中学院，2007年1月，第43页。

18) 潘磊，《赵树理与路翎之比较》，《许昌师院学报》，许昌师院，2001年第3期，第74页。

立足于“民间”写作的老舍、沈从文与赵树理笔下的“民间”及他们对“民间”的解读又不一致。陈强《试析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及张丽丽《老舍与赵树理比较散论》中论述，与老舍相比，赵树理更加执著于“民间立场”。作为文协的负责人，老舍尝试着“民间立场”的通俗文学创作，他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新文学作家的审美观点。赵树理则是将民间艺术视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在他的小说中，不仅融入了民间文艺通俗文学的艺术形式，更容纳了民间道义观念与奔放泼辣的原始生命力。因此读赵树理的小说，才真正能感受到民间生活的原始形态与原汁原味的民间情趣。”<sup>19)</sup>从以上的叙述来看，赵树理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化立场，而坚持“民间立场”的创作方式。赵树理的“民间立场”中包含有五四新文学“启蒙”的精神，但他抛弃了“启蒙”的精英化视角，以民间文艺的形式，创造出新的现代的民间文艺，作为对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别样创作姿态的尝试。王长中在《老舍与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分析》指出，时代语境不容许知识分子以精英的姿态高居讲坛侃侃而言，应该融入大众，走向民间。因此，变更小说的叙述方式成为必然。赵树理对“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的话语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从而力避‘学生腔’，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农民的话来说”。<sup>20)</sup>我们从对赵树理和老舍小说叙述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可以认识到：“在对中国古老叙事传统的批判性扬弃中，为它注入西方现代性的活力，从而将中外古今，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融合起来，既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又使作品不失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现代品性。”<sup>21)</sup>这也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的精髓，但是其中对赵树理的评价有失公允，而赵树理也从未将“民间文学传统与新文学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在对传统叙述形式扬弃之间，去建构蕴含着传统精神的现代话语。

赵树理作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有可能进一步完善这种知识

19) 张丽丽，《老舍与赵树理比较散论》，《济宁师专学报》，济宁师专，2000年第4期，第61页。

20) 赵树理，《赵树理全集》，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168页。

21) 王长中，《老舍与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比较分析》，《南都学坛（哲社版）》，南阳师范学院2001年第1期，第58页。

分子以平视的目光观照的民间立场或大众化的启蒙姿态带来的新鲜的审美趣味。可以说赵树理延续了启蒙精神而反叛了一种精英化的启蒙姿态，转用一种民间化、大众化的启蒙立场成就自己的文学艺术风格。孙犁小说与赵树理小说的不同在于，在孙犁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已经不再以一种高于农民的精英姿态出现，他极力对广大农民或农村妇女进行。这与“五四”时代对于下层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口吻有所不同，知识分子不再具有一种精神优势，而是具有一种知识分子对自我的精神反思，一种革命和政治的激情，所以劳动人民的勤劳、质朴被凸现出来。这仍然是一种知识分子似的精神探索并非真正来自于民间的姿态。赵树理不再将“自我”作为主体，“民间”作为对象，而是以平视的姿态强调了“民间”的“自由自在”的文化品格，以及“民间”对于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所产生的重要原因。陈非的《通俗传统与高雅传统的现代呈现——赵树理小说与孙犁小说创作比较》中叙述了赵树理与孙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俗雅套路。“在解放区，大众的涵盖面基本上是农民，随着社会革命体制的重新建构，农民被确认为革命的主体，由政治上的被解放者成为了解放者，由文化上的被启蒙者成为了启蒙者(知识分子必须无条件地向工农兵学习)，所以，毛泽东提出文艺创作必须向服务工农兵(主要是农民)全面转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赵树理应时而出，他的通俗化、政治化、工具化文本，与《讲话》的要求合拍。随着《小二黑结婚》等作品相继推出，赵树理几乎在一夜间拔地而起，耸入云霄，成为巨星和‘方向’，一时间扬帆领航。而孙犁则因坚守精英立场，游离在乡村文艺主流化的大潮之外而被排斥在文坛边缘。”<sup>22)</sup>杨振喜《偏执的坚守与开放的创新——孙犁与赵树理在大众化上的比较》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总之，无论是精英化启蒙姿态，抑或是大众化的“民间立场”，都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来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有着多种姿态和多元化的纠葛和相互作用。知识分子有可能保留自己精英立场，但这不一定符合文学现代化的脚步。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精英化立场，以平视的角度退守“民间”，不一定就是阻隔

22) 陈非，《通俗传统与高雅传统的现代呈现——赵树理小说与孙犁小说创作比较》，《社会科学辑刊》，辽宁省社会科学院，2007年第3期，第265页。

现代化进程的表现。

综上所述，从一系列的比较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拒绝了“五四”启蒙的精英姿态。采取了一种大众化的“民间立场”以平视的目光与他所钟爱的乡土世界进行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赵树理否定了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现代化进程，他是对五四新文艺传统的反思。在一定的时代语境中，将“五四”精神以另一种姿态延续下去，进一步推动文学现代化进程。

### 3. 知识分子身份、与农民身份的双重选择

#### 1) 自我“身份”的选择

赵树理在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游走于现代与传统，“五四”的启蒙姿态与平视的民间话语之间，具有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双重身份。首先，赵树理被称为“农民作家”，这个“农民作家”不仅仅是指创作题材和欣赏的范围，同时也是他自身的形象、气质以及生活方式。“从外表看，这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一个从俗流的眼光看十足的乡巴佬。”<sup>23)</sup>赵树理并非只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我可以这样认为，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虽然他在青少年时代甚至懵懂时代，他曾经受到乡村民间文化的影响，比如宗教会道门、迷信、四书五经、民间戏曲（上党梆子）等，而赵树理在长治四师的求学过程中，才是他的思想的真正成熟期。在这里，他广泛的接触到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这些在与他先前所接触的乡村宗教与迷信、正典文化传统的文化观与人生观发生激烈的碰撞。最后，“五四”启蒙的现代文学观念亦在他的思想中扎根。但是，这种本应迅速被文学青年当成金科玉律的文学观念，在赵树理的思想发展中却受到了阻隔。“寒暑假期中，他把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学杂志带回去给父亲看，……但父亲对他那一堆宝贝一点也不感兴趣。无论他怎样吹嘘也没有用，新文艺打不进农民中去。”<sup>24)</sup>

23)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长江文艺》第1卷第1期，1949年6月，第2页。

由此赵树理产生对新文学的质疑。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历程。由于过去的一些研究论述、历史史料主要集中与赵树理创作实践对《讲话》精神和理性的验证，这些资料对其真实的经历和创作思想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甚至杜撰。所以我们对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身份与农民作者的身份之间的微妙的转化无法作具体的考证。一个基本的事实是，30年代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运用“欧化句法”、带有“学生腔”的五四新文艺色彩，延安文学时期，解放区创作亦或是建国后的创作，赵树理的作品完全实现了他由“文坛”向“文摊”的转变。1942年太行会议上赵树理当中展示了为“五四”知识分子所“瞧不上”的通俗读物：《太阳经》、《玉匣记》、《老母家书》、《增删补益》、《洞房归山》、《秦雪梅吊孝》等在民间或在农村广泛流行的小册子。这一举动正是赵树理向自身知识分子身份的一个挑战。作为“农民作家”赵树理显示了与五四新文艺的疏离，他的作品紧密地与农村题材、农民文化趣味连在一起。这使得在高扬“五四”文化启蒙精神的80年代，赵树理成为一位“以中国下层农民传统战胜和压倒西来文化”的作家。在与“现代/传统”、“启蒙/革命”、“精英/大众”之间，赵树理显然全部选择了后者。

然而，在对赵树理文学作品比较研究的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特质。如赵建国《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中有专章专节“农民作家和农民知识分子作家”论述了赵树理与孙犁的不同，赵树理是具有“知识分子性”的农民作家，孙犁则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作家。孙犁基本上属于“五四”知识分子创作思路和范畴，而赵树理的创作则颠覆了“五四”精英化的创作姿态，以平视的视角创作农民喜闻乐见的作品。这并不意味着赵树理就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特性，他的作品也是包含着“启蒙意识”的“问题小说”。在这种姿态下，又不可回避赵树理对传统文化的钟爱，属于传统与民间的文化元素很自然的称谓赵树理小说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但这并不妨碍它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在与张爱玲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从周云鹏的《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传统》中可以得知这两个风格迥异，主体明显差异的作家能够放在一起比较，既

24)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长江文艺》第1卷第1期，1949年6月，第2页。

可以将他们放在“五四”文学传统与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将起并置的理由。文章认为可以将“赵树理和张爱玲置于这样一个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二者分别作为四十年代解放区和沦陷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于其之前五四文学传统的既继承发展有搁置摒弃的现象，很值得研究。”<sup>25)</sup>虽然赵树理和张爱玲都对“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有一种反叛的态度，他们都致力于与“民间”的平等对话，这必然颠覆了知识分子启蒙精英的姿态。在他们的作品中，启蒙的意义仍被贯穿于字里行间。无论是赵树理的小说中的“问题意识”，还是张爱玲小说中对人生另一种“苍凉”式的解读，都成为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承继。张爱玲这个生活在大都市有着许多异质于“五四”女作家品格的天才作家，体现了市井民间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民间文化形态的融合。

## 2) 文化“身份”的确认

在赵树理的身上，则“实际上体现农民民间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以及国家权力话语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我认为，赵树理在‘讲话’之前的创作中，民间艺人和启蒙者的双重身份已经相当明显。”李先强在《中国新农民形象对阿Q形象的承传和反叛》中通过论述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延续了“五四”启蒙中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税海模《鲁迅、赵树理与毛泽东——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轮廓》<sup>26)</sup>中论述了鲁迅、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对毛泽东《讲话》理论的印证和贯彻，揭示了“如果说鲁迅为中国文学成功地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学‘范式’，标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正题’的话，那么，赵树理以民间文艺为基础创造革命大众化文学‘范式’，则标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反题’。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发展则可看作对鲁迅与赵树理的继承、超超与对上述‘正题’、‘反题’的综合。”

25) 周云鹏，《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传统》，《云梦学刊》，湖南理工学院，2002年第4期，第54页。

26) 税海模，《鲁迅、赵树理与毛泽东——兼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轮廓》，《贵州社会科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2000年第3期，第57页。

“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出于思想启蒙、引进世界新潮的缘故，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以欧化为标志的文学变革的话；那么，这个变革事实上却将新文学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护赵树理所提出的，实际上是用民间文艺传统去变革欧化的新文学，以促进新文学大众化这样一个对‘五四’新文学创作‘范式’予以修正的历史课题。”邓慧《途异而归同：都市文化催生下的乡土文学——沈从文与赵树理创作比较》从几个方面比较两者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异同兼具的文化身份，他们作为出身于农村的乡下人，接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成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两者不同的文化身份在于沈从文是将乡村当作参照的对象，仍然立足于城市；而赵树理则是“停在乡土的此岸驻足乡村”的执著的“乡下人”，是一个受到现代文明浸染但人执著坚守“乡土”的知识分子。“他从而拥有了政治小说家和乡土小说家的双重文化身份，这不可避免地使其创作与政治主流意识存在着较明显的联系。”<sup>27)</sup>这正是赵树理与沈从文的不同文化身份，也注定了他介于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双重身份的复杂选择。朱庆华的《鲁迅、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互补式贡献》是从鲁迅与赵树理在农民故事的叙述时，比较了鲁迅与赵树理不同的文化身份，“鲁迅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为农民立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俯视农民的心灵世界；赵树理则以农民的身份、立场为农民画像，视农民为兄弟手足，与之同欢乐、共患难，热情为农民鼓与呼。”<sup>28)</sup>他们所共同的是他们身上都存在着知识分子的特性。赵树理的作品更是延续了阿Q精神所包含的“启蒙”特质，它以“大团圆”的结局代替了阿Q悲剧似的“团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无法否定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启蒙意识。鲁迅与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以不同的姿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立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李明的《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考察》通过对鲁迅与赵树理的比较中总结：“他承继了鲁迅等启蒙民众的文学主题，又以群众能够接近的方式走进农民大众，接受农民的启蒙，实现了启蒙者(知识分子)——

27) 邓慧，《途异而归同：都市文化催生下的乡土文学——沈从文与赵树理创作比较》，《许昌学院学报》，许昌学院，2006年第4期，第54页。

28) 朱庆华，《鲁迅、赵树理对现代文学的互补式贡献》，《学术论坛》，广西社会科学院，2004年第3期，第123页。

被启蒙者(农民大众)与启蒙者(农民)——被启蒙(知识分子)的良性互动。”<sup>29)</sup>

“五四”时代可以说是占人口数量小部分的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所以，“五四”小说在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不过它主要将文学集中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城市中部分受过较高教育的市民、店员等人群中，却将更广大的工人、农民及文化水平较低的市民却被排除在外。这种局面正是由于“启蒙”这种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精英话语无法团结和教育最广泛的民众。赵树理正是放弃了这种空中楼阁似的“启蒙”姿态，放弃了知识分子精英化的姿态，保留了知识分子开启民智、教化民众的责任，将一个知识分子的姿态投入到民间，与民众融合为一，以一种平视的目光不再将民众作为对象，而是将自身当成农民中的一员，这种知识分子与农民融为一体的复杂身份正是他实现小说真正“大众化”、“民间化”的基石。正如陈思和所分析的：“他所谓的作用，不仅仅是利用通俗手法将国家意识形态普及远行，也包含了站在民间的立场上，通过小说创作向上传递对生活现状的看法。这才是赵树理拥有一般工农作家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因此他的创作也不单单是拥有了形式上和直接上的民族特色，而是在整体精神上的民间意识。”<sup>30)</sup>赵树理放弃了“上”对“下”的文学现代性启蒙；他站在并不能掌握话语权的民间立场上，由“下”而“上”对国家意识形态发表意见，虽然在当时的语境下这种声音是微弱的。这种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的转变，使赵树理小说与广大群众保持“无间离”的密合状态。这种所谓的民间姿态有着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性，正是由于这种独创性和知识分子特有的固执，他使自己的作品在当代文学规范建立的过程中越来越发出不和谐音。然而，不管怎样，赵树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对旧形式的现代性改造上回答了应该怎样扩大读者群、吸纳更广大市民读者的问题。又以独特的“启蒙”姿态和美学观念突破了文学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神话”，从而很好的补充了“五四”小说的

29) 李明，《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考察》，兰州交通大学学报》，兰州交通大学，2007年第2期，第7页。

30) 陈思和《民间文化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钩沉》，本文为作者发表于《上海文学》，上海文学杂志社，1994年第1期，第73页，长篇小说《民间的沉浮》第二部分，收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

现代性方案。

##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赵树理比较研究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赵树理与“五四”时代作家进行纵向比较，拓展历史的空间；与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横向比较，确定赵树理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价值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对赵树理比较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印证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中国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文化”、“知识分子/大众文化”等）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的发展变迁，从而考察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更替对赵树理创作的影响，进而发现在这种复杂更替的变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生成演进机制对于“经典”的构造功能和意义，透视出现代文坛作家作品生成“经典”的可能的话语情境。同时，将赵树理比较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置于“现代性”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在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基础上，提供对文学发展的“现代性”的另一种视角的审视。

## 参考文献

-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赵树理研究文集(近20年赵树理研究选萃)(上、中、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
- 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版。
- 杨品,《做公众的代言人——从赵树理到张平》,《太原师范学院学报》,山西省作家协会,2003年第1期。
- 潘磊,《赵树理与路翎之比较》,《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 董大中,《赵树理与鲁迅》,《山西文学》1982年第3期。
- 杨新敏,《赵树理“问题小说”与五四问题小说的比较》,《山西师范大学报》1992年第3期。
- 肖佩华,《解读“农民意识”——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笔下的农民形象的比较分析》,《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 林铭,《解读“农民意识”——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的比较分析》,《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 李占伦,《鲁迅和赵树理农民小说的比较》,《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 陈强,《试析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
- 杨振喜,《偏执的坚守与开放的创新——孙犁与赵树理在大众化上的比较》,《天中学刊》2000年第4期。
- 赵建国,《赵树理、孙犁比较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 李先强,《中国新农民形象对阿Q形象的承传和反叛》,《台声·新视角》2006年第1期。

## Abstract

Carrying on Awaken Myth in May 4th and Betraying Elite Authoring Posture  
— Finding out comparative Study of Zhaoshuli's Novel

Zhu, Ling

This paper takes comparative study as study target. It widens history space by analyzing lengthways comparison of Zhaoshuli and author in May 4th. It confirm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value and position of Zhaoshuli's novel by crosswise comparison of contemporary author. It goes on awaken spirit in May 4th and unscrambles literature in May 4th by another form. It pulls down elite narrating form and goes on history task by popular awaken posture by way of dialogue with local. Zhaoshuli affluxes local posture and wealth without conformity by modernity in May 4th and literary direction as core guide by way of modernity to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 Zhaoshuli, Comparative Study, Enlighten, Elite Writing, Folk Art

투 고 일 : 2015. 5. 10. / 심 사 일 : 2015. 5. 15.~ 2015.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6. 16.
--